

日本學者研究

中國史論著選譯

歷史與現代

第一卷

通論

劉俊文主編  
黃約瑟譯

日本學者研究  
中國史論著選譯

第一卷  
通論

中華書局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

第 一 卷

通 論

劉 俊 文 主 編

黃 約 瑟 譯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8 $\frac{1}{8}$ 印張·2插頁·166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冊 定價：14.30元

---

ISBN 7-101-00998-0/K·401



桑原  
隲藏



白鳥  
庫吉



和田  
清



内藤  
湖南



濱口 重國



前田 直典



宇都宮 清吉



宮崎 市定

## 序 言

周一良

中華書局將要出版劉俊文君主編的三百萬言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甚盛事也。承蒙不棄，囑我寫序，深感惶恐。現在從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的背景與所繼承的傳統、目前研究的特徵、以及本書的意義，提出幾點粗淺看法，談談自己的感想，以就正于中日兩國的史學家。

自從舊石器時代以來，日本的固有的文化綿延不斷，久遠相傳，璀璨光輝，不同的歷史時代各有特色。同時，日本接受中國文化有悠久的傳統。大化改新（六四五）全面吸取中國典章制度，八世紀的奈良時代，已有人熟練地寫漢文漢詩。雖然以後漢學遞有盛衰，到江戶時代（一六〇〇——一八六七）這二百多年間，不少的文人學士都能用典雅的漢文著書立說。以朱子學說為核心的宋學，在德川幕府倡導支持之下，風靡一時。傳播中國文化的機構，除幕府主辦的昌平官學之外，各地大名有藩學，不少學者有私人講學的家塾。江戶時代不僅輸入大量漢籍，還大量加以翻刻，《二十四史》就有一半出現和刻本。和刻本多附有訓點，以利日本學子研讀，實際上起了翻譯的作用。明治以後的日本學者，就是在這樣漢學傳統的背景之下從事中國史研究的。特別是古義學派實事求是的實證主義傳統，在日本以

後的漢學研究中留下深刻影響。

古義學派倡始人伊藤仁齋（一六二七——一七〇五）從語言亦即中國所謂小學出發，標舉運動的「道」為孔子學說的中心，認為孔孟根本沒有提出過宋儒所主張的靜止的「理」。其說往往與清儒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觀點相合，而仁齋的《語孟字義》（一六八三）早于戴氏《孟子字義疏證》（一七六六）約八十年。荻生徂徠（一六六六——一七二八）也主張從文字入手，來探討中國思想。他認為不能只通過訓點從表面理解中國古典，還須具備運用中國文字語言的能力，實即意味着按照中國方式思維。他的弟子山井鼎利用日本所存古寫本及刊本，校勘中國經典，編成《七經孟子考文》（一七六一）。四十餘年之後，清朝纔出現類似的工作，即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在史學方面，伊藤仁齋之子東涯（一六七〇——一七三六）著《制度通》，綜述中土歷代各種制度，並與日本比較，簡明確切，至今猶可供參考。安積澹泊（一六五六——一七三七）的《湖亭涉筆》（一七二七）考訂《通鑑》等書所記史實，踏實具體，不作空論。江戶時代除有伊藤、荻生等學者自成傳統之外，清朝乾嘉時代的考據之學更深影響了日本漢學。以戴錢段王為代表的樸學學風，為日本漢學家所服膺。日本漢學大師狩野直喜（一八六八——一九四七）經常說，明治以來日本的中國文史研究，其性質實係「清學」。所以，今天日本研究中國史的論著，首先繼承了中日雙方的考據之學的傳統。

對待本國的文史古典，江戶時代的日本學者也和以前有所不同。他們不再局限于從神道思想或武士精神來闡述古典文獻，而是表現出新的趨勢，大力廣泛蒐集資料，注意考訂具體問題，也就是表現

出實證主義精神。五歲失明的盲人學者塙保己一（一七四六——一八二一）建立和學講談所，蒐求、校訂、編輯、出版了日本歷朝的史料。又網羅古典文獻，一八一九年刊行了包括一千二百部、六百七十卷古書的《羣書類從》。還有包括一千八百多部古書的《續羣書類從》，編輯完成而未及刊行。德川光圀（一六二八——一七〇〇）創始編修，前後歷時二百五十年完成的《大日本史》，用子注方式注明史料出處，是體現實證主義精神的創舉。服膺朱子學的林羅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也主張利用中國及朝鮮史料，來考訂本國歷史。本居宣長（一七三〇——一八〇一）和伴信友（一七七五——一八四六）都是以考訂日本古典文獻著稱的學者，他們精湛的研究成果，與乾嘉樸學有相通之處。江戶時代著名學者、政治家新井白石（一六五七——一七二五）更是主張調查研究，詳細佔有材料。在此基礎上，他獨具隻眼，縱觀日本歷史，提出看法。這樣的優良傳統，流風所被，自然不能不影響日本學者的中國史研究。

明治以後，傳來了歐洲史學學風及方法。一八八六年創建的東京帝國大學，次年即在文科內設立史學科，聘來了德國學者路德維希·利斯（一八六一——一九二八）任教授。利斯是利奧波德·封·蘭克（一七九五——一八八六）的弟子。他除去講授其專長之英國憲法史等課程之外，還講授了歷史方法論，傳播了蘭克學派嚴格依據史料以求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的教導。利斯休假回歐洲時，親赴海牙、倫敦、羅馬等地，蒐求有關日本的史料。這些都為日本近代史學教育與訓練打下了堅實基礎。以後坪井久馬三（一八五八——一九三六）、白鳥庫吉（一八六五——一九四二）等，分別在西洋史和東洋



史方面傳播並實踐了蘭克學派的學風，成爲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另一傳統。

上述中國的、日本的和西方的三方面傳統，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明治以後的中國史研究，白鳥庫吉受西方學術影響較深，內藤湖南（一八六六——一九三四）受乾嘉樸學影響較深，兩人分別巍然成爲東西兩京中國史研究的長老，而桑原鷺藏（一八七〇——一九三一）則兼承乾嘉與歐洲學術傳統，是明治以後中國史研究的又一巨擘。他們是本書所收近百名學者中最爲年長的三人。繼他們之後，六、七十年間，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已經形成了一支龐大可觀的隊伍。從前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軼詞》中舉出本世紀初京都的漢學家——「東國儒英」，是「藤田狩野內藤虎」。內藤湖南出身于東北的秋田，狩野直喜來自西南的熊本，而藤田豐八（一八六九——一九二八）則是中部德島人，可以說代表了全國各地。今天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更是來自東西南北，工作崗位也遍佈于日本各地。本書所收唐史專家布目潮瀨，甚至是來自夏威夷呢。

關於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特徵，我想指出下列幾方面。

一、遵守乾嘉樸學大師的教導：讀書必先識字。日本學者非常注重古漢語的訓練，例如大學的史料演習班上，必須弄清史料每個字的含義。治少數民族史者，必能瞭解其語言文字。研究佛教史者，多通曉藏文梵文。

二、注重窮盡資料，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因此各種索引齊全，幾乎很多專題或專書都編

有詳備索引可供檢索。日本學者不僅注意存在于本國和中國的史料，即使散在世界各地的，無不想方設法去蒐集。敦煌卷子發現後，我國學者在北京坐待伯希和幾次帶來的少數寫本，而日本學者聞訊後立即奔赴歐洲蒐訪，移寫回國刊佈。那波利貞、榎一雄、藤枝晃、池田溫等，都對敦煌文書的流傳與利用作出很大貢獻。如果不具備日本學者的種種條件，能備訪各國，像《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和《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這樣巨大完備的結集是難以想像的。耶穌會士送回國的報告，是研究明清時代歷史的上好資料。我國還沒有人注意及之，更談不到譯為中文加以利用，而日本則已經出版了選譯本。

三、日本學者注重結合書面記載進行實地調查。二十年代，常盤大定（一八七〇——一九四五）進行了中國文化史蹟與佛教史蹟的調查。以後不僅考古方面，許多史學工作者都在研究文字材料的同時，來華從事實地考查，藉以增加對歷史的感性認識，與文字記載互相補充發明。

四、從研究領域來看，日本學者治中國史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思想、宗教、法制、科技、中外關係、歷史地理等各個方面，涵蓋極廣，從本書大致可以窺見。宗教中尤其佛教，在日本極為活躍，信徒衆多。有關佛教的書籍構成厚厚一冊目錄，為任何尊佛教為國教的國家所未見。因此，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在日本也特別興盛。其方面之廣，人員之多，論證之細密，探討之深入，確非我國所能及。又例如天野元之助之于農業史，篠田統之于食物史，皆專門名家，為我國學者所未遑顧及。

五、就時代而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幾乎從遠古到近代現代，各個時期都有人鑽研，沒留下多少空白。當然，這種情況也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幾十年來逐漸發展形成的。以魏晉南北朝史為例，四

十年代末之前，只有岡崎文夫兩本著作《魏晉南北朝通史》及《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有關這一時期的論文也極少，比起其他段落，如漢、唐、宋、明等，顯得異常冷落。五十年代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我與外國學術刊物接觸日少，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也隔膜起來。到八十年代初，我重理舊業——魏晉南北朝史，再翻閱這三十年的刊物，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日本學者急起直追，填補空白，不僅某些老一輩專家對魏晉南北朝史作了不少貢獻，各地還出現從事于此的新秀，如著有《六朝貴族制研究》的中村圭爾等。還有魏晉南北朝史青年研究者會，會員達三十餘人。有關這段歷史的論著今天異彩紛呈，與其他各段相媲美。即此一端，就足以說明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之興旺了。日本學者大都分兵把口，各守一段。但也有些大家兼及幾段，如內藤湖南通觀全局，形成自己對中國古代史的看法。本書共分十卷，而七卷之中皆收有宮崎市代表性論文，西嶋定生的論著也涉及多卷。由于在各段有造詣，因而他們具備條件在理論上作出自己的概括。川勝義雄（一九二二——一九八四）與谷川道雄，也都通過中世史理論的闡述，對中國古代史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

六、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成果，有足夠廣濶的發表園地，主要的全國性刊物如《史學雜誌》、《東洋學報》、《東方學報》、《東洋史研究》、《支那學》、《東方學》等等。還有類似我國大學學報的各大學的紀要。這裏應該特別提到的，是為慶祝「還歷」、「古稀」、「退官」等場合而編輯的論叢，亦即西方所謂 *Festschrift*。此風昉于歐洲，傳入日本。日本第一部祝壽的論叢，是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而白鳥氏也恰是本書所收學者中年輩最長的一位。此書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六十餘年來，日本有

關中國文史研究方面的論叢，已出版約百種以上。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論叢也可以說是日本中國文史研究的「一里塚」吧。〔一〕

本書的編選和出版，極富意義。

首先，本書是我國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大規模介紹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的成果。自中日建交，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近年我國學術刊物有時譯載日本學者史學論文，也出版過日本學者的專著。但多屬零星分散的、不系統的介紹，甚或不免於片面性。本書的編選，是劉俊文君從客觀立場出發，以學術為唯一準繩，訪日期間與日本各方面學者幾經討論，反覆協商，取得一致贊同的結果，應當說是較為公允全面的。

上文所舉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特徵，其主要者在本書所選論著中都充分有所體現。諸家論述有的角度與觀點新鮮，有的結論富于創見，有的考證邃密有特色，有的專題前人很少涉及，有的領域為一般所忽視。這些優點或獨具或兼備，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諒不為過譽。

本書另一特殊意義，不容忽視。它是中日兩國學者、編者、譯者、出版者等各方面人士共同努力和辛勤勞動的結果，與一般泛泛的中日文化交流有所不同也！

最後，作為日本史的愛好者，我談一點感想。

中國有關心日本的傳統。三世紀著名史家陳壽所撰《三國志》中，已有專篇記述日本——《倭人傳》，至今還是研究古代日本的重要依據。十九世紀末，詩人學者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〇五）有旅日經歷，從新政需要出發，撰《日本國志》，也着重敘述了歷史。但是，二十世紀初年雖一度東渡留學蔚然成風，而專門研究日本歷史，歸國後有所成就者寥寥無幾。這種情況長期未有改進。近十多年來，我國的日本史研究纔有長足發展，人員、機構、論文、專著都大見興旺。但對照本書所收論著的年代，同一時期我國關於日本歷史的研究，不能不說相形見绌。世間事無獨有偶。英美兩國之間在語言文化等許多方面都有千絲萬縷聯繫，其關係之密切，大似中國與日本，而美國學者對英國歷史的研究，其態度之積極，造詣之精深，成果之衆多，一般而言，遠遠超過英國學者之于美國歷史。這種類似其原因何在，倒也值得探討。這裏我順便提出有關我國日本史研究的幾點想法，也許不是多餘的話。

一、應當大力翻譯日本古典的和近現代的史學名著（包括重要原始史料和後人論著），附以導讀性質的序文和必要注解。積有成數以後，中國學生就可以和日本學生同樣接觸重要著作，和他們站在大體相等的起跑綫向日本史學冲刺。這一點，西方的日本史學界做得較好，不少名著已有西文譯本。日本學者讀漢文有很大便利，他們仍然積極翻譯中國名著，不少書有數種以上日文譯本。

二、學者之間應有所分工，專精某一時期或某一方面的日本歷史，只有如此纔能深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的作法對我們大有啟示。與此相應，必須略通這一時期的語言，適當接觸一些原始資料。對日本學者而言，只要能讀通中國的文言，就大致可以駕馭我國秦漢以後的史料。日本史則不同，各

時期的史料在語言上有很大差異，不額外下點功夫是不行的。

三、百年以來，日本學者對本國歷史進行實證主義的研究，在史料的蒐集和專題的考訂上，早已作了大量細緻而深入的工作。我們研究日本史，則應在充分利用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揮我國學風之特點。例如：一、凡事問一個爲什麼。不僅要求其然，而且要求其所以然。瞭解事情的根源由來，就能更深刻掌握歷史，吸取經驗教訓。二、把微觀的考訂分析與宏觀的綜合概括結合起來，因小以見大。一個小問題孤立也許看不出意義，放在大環境、大潮流中，從大局全局看，就較易發現其作用。三、不只是就事論事，而是放眼聯繫縱觀。對待事件、人物、制度等都是如此。研究人物應聯繫所處時代及其所屬的社會階級及階層，研究政治制度、文化現象等，應聯繫經濟的發展，如此等等，就可得到更深入一些的看法。例如我國史學界近來有人重新評價明末的洪承疇、江戶時代的田沼意次，作出與以往不同的結論。四、重視個人的作用，重視地理環境的作用。二者不能改變歷史前進的總趨勢，但在一定條件下，一定時期中，一定程度上，個人和地理環境是會起決定作用的。以上的設想，就是以唯物辯證法爲指導而形成的學風。我相信，我國學人努力吸取日本學術界研究成果，再充分發揮自己之所長，假以時日，例如二三十年，完全應該能够編出一部《中國學者研究日本史論著選譯》，介紹給日本史學界。這樣，中日兩國史學界的雙向交流就更趨完整。我雖年登耄耋，猶將引領以待！

〔一〕日本古代交通大道兩側，每隔一里築土成方堆，其上植榎、松等樹木，以記里程，並供旅人休息，名一里塚。

## 編者識語

劉俊文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傳統，自從明治時代創立近代科學的「東洋史學」以來，經過百餘年間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和積累，成就顯赫。現在，日本擁有世界上（除中國之外）最龐大的中國史研究隊伍和最繁多的中國史研究成果，並在理論、方法及學風等各個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其研究水平，就總體而言超過歐美，在許多領域中已與我國并駕齊驅，而在某些我們未遑顧及的領域裏則獨佔鰲頭，居於世界前列。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本世紀前半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種下的民族仇恨，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日兩國長達二十多年的睽違隔絕，由於我們一些人至今潛存的某種盲目自大心態，我國史學界對於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知之甚少，偶有所介紹亦不免狹隘片面。這種情形不但嚴重地阻礙了我們借鑑和利用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成就「以石攻錯」，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而且也使日趨頻繁的中日兩國學術交流缺乏實質性的內容而流於空泛，影響了國際中國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有鑒於此，筆者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一九九一年四月應日本學術振興會之邀赴日遊學期間，特別留意考察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情況，先後訪問了三十餘所國、公、私立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參加了十

餘次較大規模的學術會議和兩個小型研究班的長年活動，拜會了一百餘位中國史研究者，查閱了四百餘種研究論著，大體上摸清了日本研究中國史的歷程、現狀和成就。在此基礎上編寫了兩部書，一部是即將在《文史知識》雜誌連載的《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該書共分十章，從歷程與傳統、學派與論爭、現狀與動向三個方面鳥瞰式地介紹了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情況，目的在為瞭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提供總括性的背景知識；再一部就是這套《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本書選收日本明治時代以來近百位第一流學者及有成就專家的一百五十餘篇優秀論文，譯成漢語，集為十卷，其中第一卷通論、第二卷專論，主要收譯有關中國史的理論性研究論文；第三卷上古秦漢、第四卷六朝隋唐、第五卷五代宋元、第六卷明清，主要收譯有關中國各斷代政治、經濟、社會史的研究論文；第七卷思想宗教、第八卷法制、第九卷民族交通、第十卷科學技術，主要收譯有關中國各專門領域史的研究論文，全書總計三百餘萬字。目的在於全面、系統展示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的主要成果，為瞭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提供實際材料和確切線索。

為了保證本書的權威性和客觀性，筆者在編選過程中緊密依靠日本東洋史學界，採取了「從日本學者中來，到日本學者中去」的工作方法。總的編選方針是筆者確定的。人選學者的標準是：一、一流水準；二、廣泛影響；三、代表各個不同學派和學術風格。人選論文的標準是：一、反映學者最高研究水準；二、已經發表並產生過較大影響；三、尚未譯成中文（個別極重要論文可以例外）。遴選原則是：一、詳生略死（已故學者人選額為三分之一，健在學者三分之二）；二、詳近略遠（戰前論文人選額為四分之



一，戰後論文爲四分之三；三，多少不等；戰前故去學者一般選文一篇，戰後故去及健在學者依研究領域之廣狹，研究成果之多少，學術影響之大小選文二——九篇。但是，具體選哪些學者和哪些論文，則是由日本東洋史學界提出並議定的。筆者首先個別徵求日本學者的意見，擬出入選學者候選名單，和人選論文候選目錄，然後將此名單和目錄印發日本東洋史學界廣泛評議，再根據評議增補刪改，前後反覆五次，參與評議的範圍達一百二十餘人，最後纔正式決定。衆所周知，日本東洋史學界有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之分。但是，在本書編選過程中，無論東京學派、京都學派都能從促進中日學術交流這一共識出發，捐棄門戶之見，通力合作。儘管如此，限於客觀條件，少數符合標準的學者如津田左右吉、藤田豐八、常盤大定等等仍未能收入，所選論文也多有明珠之遺，但從整體上看，正像中日兩國史學家評論的那樣，本書還是公允地、如實地反映了一百多年來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概貌，讀者諸君可以信賴。

本書的編譯出版是一個巨大的工程，能够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圓滿完成，不得不歸功於中日兩國學術界、出版界以及社會各界的熱烈支持和大力協助。筆者在此首先要衷心感謝欣然出任本書顧問的中日兩國史學界的元老耆彥，感謝積極參與本書編選工作的百餘位日本學者，尤其是其中並未入選本書的學者；感謝熱情承擔本書翻譯任務的二十多位中國學者和留日學生，尤其是其中來自臺灣和香港的教授、專家；感謝慷慨解囊爲本書提供贊助的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和克服困難確保本書提前出版的中華書局。同時，還要向堪稱爲本書功臣的下列各位表示特殊的敬意，他們是：爲促成本書編